



岁月书



岁时笑

# 俯首人间

柴薪

每年春天,漫山遍野,只要是活着的树木,都会齐齐生发出嫩嫩的枝叶,青翠欲滴。树木的这种生发,周而复始,连绵不绝。沙湾河江边的那排柳树已全部换上新叶,垂下千万条发丝。走近时可见,洁白的柳絮在轻风中飞扬,一朵一朵,细,柔,轻。

桃花、梨花、杏花、油菜花、豌豆花、蚕豆花,还有田间地头、江江河滩上、堤坝上不知名的野花,那么多的花,争相回来了。

橘树也开花了,但不是全开,那些花骨朵紧紧挨着,似曾相识,像湿漉漉的脆生生的新面孔在相互簇拥着、盼望着。橘树下去年的草已发黄、枯死。细看,新的小草已从枯黄的草根边抬起了头。

在沙湾,河江低于河滩,河滩低于菜地,菜地低于村庄,村庄低于树木,树木低于飞鸟,飞鸟低于天空。

在这低低的人间,似乎一切都是新的。我站在沙湾菜地上,望着不远处村庄,莫名生发出些许感触。我只是一个外乡人,一个偶尔驻足、偶尔路过的眼,眼前村庄的一切本与我无关,我看到的只是村庄的外表和外部,却不了解村庄的内部与内核,更不要说村庄里生活的人。

近处,眼前菜地上油菜花已经快落完了,油菜大都结实,一排排碧绿的油菜荚子整齐划一,向远处的村庄漫漶。夕阳下,油菜的尽头树木丛中的村庄远望过去,似乎有点老,有点旧,有点茫茫。我忽然感觉自己也有点老,有点旧,有点茫茫。

其实,我更像是一个旧人,在时间面前。整个四月,天都是阴的,雨水似乎没有停过。

转眼到了五月,蔬菜疯了似地往上长,挡也挡不住。辣椒也开花了,星星点点的,很细很白。有几棵已长出小辣椒了,瘦瘦的,嫩嫩的,让人爱怜。西红柿细细的黄花在绿叶间闪烁,挂在枝间的几个青色的果子有一股青涩的味道。南瓜一声不响地长,瓜藤粗壮,瓜叶霸气,四季豆也一个劲地攀缘,蓬勃生长,但也有个别几株莫名枯萎。

那日沙湾的风真大。四周空旷,菜地上的风更大。丝瓜爬在高高的架子上,墨绿色的叶子像一面面小旗卷着,发出呼呼的声响。黄瓜矮一点,嫩嫩的枝头在风中不停地颤抖。辣椒更矮,白色的小花在风中忽闪忽闪。沙湾堤坝上柳树的叶子在翻卷,就像一本书,被人随手翻了翻,哗哗,留下一阵声响,却没有完全翻开。构树的叶子密、厚、挺,风翻不动它,风从构树枝叶间穿过,叶子便不停地抖动,像在和风不停地握手。

俯首人间,方才看清,低处的泥土里藏着所有向上的生。

日报只有一个晚会报道记者名额,重任交给了(我),纷纷打招呼,希望我能把他们写进报道中去,有人问:“你能进入广场中央吧,你能见到国家领导人吧?”“能!”我大声回应着,脚下的步伐变得欢快、轻松,一点压力也没有了。临近金水桥东,忽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,哦,是我们北京日报社的团队!本来我也是其中的一员,也参加过几次集体舞的培训,立即被同事们拉进了跳舞的阵容。乐曲响起来了,那是我熟悉的云南民歌“阿细跳月”。正值青春,顷刻被那欢快、动听的旋律感染了,被那优美、激越的舞姿陶醉了。舞曲间歇,我有点卖弄地说,阿细跳月的故乡在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弥勒县(现为弥勒市),她的名字叫叫邑,我曾去那儿采访过。“啊,真棒!”大家欢笑着。

那是一个多么令人难忘的国庆之夜、青春之夜啊!

30多年间,我得了五个“中国新闻奖”,在编辑岗位上荣获了首届全国“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”。退休后,终于有了自己的时间,我一点没有“老”的哀叹,也没有工夫哀叹。我给自己起了个词:“青春晚期”,提醒自己抓住青春的尾巴,再多写几篇文章,力争写出几篇好文章。从第一本书《走进焦裕禄世界》问世,到散文集《笔底波澜》《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》《西河渡》等,一部部作品相继出版。

我的“青春晚期”过得无悔,也算“犹灿烂”吧。

回望走过的路,青春早已远去,可我心里的激情却从未熄灭。记得1974年,我这20岁的插队知青第一次回家探亲,扛着半麻袋自己亲手栽种的、收获的白薯,去看望恩师臧克家先生。臧老特别高兴,用浓重的山东口音给我朗诵了那天刚刚完成的一首诗:“自沐朝晖意翳翳,休凭白发促呼翁。狂来欲碎玻璃镜,还我青春火样红。”

还我青春火样红!

那条乡间小河依旧在心底流淌,对生活的热爱依旧滚烫。我不追求文坛的盛名,不奢望华丽的光环,只愿做一个踏实的写作者,守着一方书桌,握着一支瘦笔,写人间烟火,写山河岁月,写赤子之心。我的青春诗篇,没有惊天动地的壮阔,却有脚踏实地的坚定;没有炫人眼目的华丽,却有始终如初的真诚。它写在乡土之上,写在时代之中,写在每一个被真情温暖的日子。

墨妙精英册页(局部) (中国画)  
来楚生 陆俨少 刘海粟美术馆藏



# 青春诗篇

李培禹

青春是与诗歌相伴的,诗歌是青春最好的表达。年轻时,我以为只有诗人才写诗,那时已在报刊上发表过若干首诗的我,心里难免有点得意。一次,和报社一位女同事聊天,聊得投缘时,她拿出一个笔记本,犹豫了一下,还是递给了我,说:“这本子是第一次给别人看,千万给我保密啊。”翻开这本日记,我惊呆了:许多篇章都是诗歌啊!有的诗句,我一眼就被“震”到了,来自生活、真情实感、少女情怀,真的是好诗。我问:“这么美的诗怎么不拿出去发表?”她笑了,说了一句诗样的话:“我偷偷写的,只留给自己看,现在,有了一个知音。”此后,我们真成了知音。

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诗人,尤其是在青少年时期。作家王蒙19岁时创作的长篇小说《青春万岁》,开篇就是一首序诗:“所有的日子,所有的日子都来吧,让我编织你们,用青春的金钱和幸福的瓔瓔,编织你们……”

我的青春,也是从写诗开始的。

都说少年的记忆最清晰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,我们那条小胡同里也出现了“文艺宣传队”式的街头演出。其中一个叫苏伊的女孩舞蹈跳得好,许多时候,她都是主演。当时我们这一群整天“混”在一块的伙伴里,大概只有我是因为另一个原因喜欢盯着她多看几眼——苏伊的爸爸是我国著名诗人臧克家。那个时候,诗歌的种子已埋藏在我的心里。1972年,我在北京二中读高中时,诗情正“勃发”,一口气写下了300多行的长诗《雷锋和我们同在》。写完之后,自己朗诵,激动不已。那天,我糊了一个大大的信封,装进厚厚的一摞诗稿,心跳加速把它交给了苏伊。记得她瞪大了那双美丽的眼睛看我,我赶紧转身逃离……

显然,苏伊十分认真地完成了我的托付,把我的诗交给了刚从向阳湖干校返京不久的父亲。正是这首长诗“处女作”,使我登堂入室,去面见我崇拜的大诗人臧克家先生。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呢?虽然它明显带着模仿致敬之、郭小川和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“阶梯诗”的痕迹,但今天读来,我

仍有一种青春的涌动:“天山的雄鹰呵,你们为何扑打双翅/唤来风雪,莫不是/要让冰峰洁白/南来的大雁呵,/你们为何/组成利剑/一字排开,莫不是/要把白云剪裁/奔腾的河流呵,/浩瀚的江海,/你们为何/激起浪花/水拍云崖,/莫不是/源头引下银河来……”

自此,我成了赵堂子胡同15号臧克家先生寓所的常客。

青春色彩最浓重的一章,写在19岁我高中毕业后插队下乡的顺义谢辛庄。离开京城来到农村的广阔天地,田野、泥土、炊烟、老乡,构成了我青春最真实的风景。白天下田干农活累得要死,夜晚在昏暗的灯下读书写作,与心灵对话。村边那条无名的小河,日夜潺潺流淌,伴着我的喜怒哀乐,载着我的青春过往。多年之后,我写下散文《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》:“它是那样的美丽,清静地从村子旁流过,绕过知青大院不远处,河面变宽,形成了一个天然湖泊。是我们叫它湖,贫下中农称它‘泡子’,它的确太小了,小得连个名字也没有。水从哪里来,流到哪里去,我们全然不知。可在我们眼里,它真的很美:河边

是茂盛的钻天杨,水岸边生长着摇曳的芦苇。”“三夏”收工后从它身边走过,捧起清凉的河水擦擦汗,涮涮镰刀,顿感一身轻松。女生总能最早适应环境,她们的做法也比男生胆大。一天傍晚,我和同宿舍的立成、吴川往河边走,被一位大嫂拦住。她说,你们不能过去!为什么?大嫂郑重说,你们的女知青在洗澡呢!“洗澡”就是游泳,这个我们知道,但还是红了脸,心里一阵狂跳!冬天大雪纷飞,队里歇工了,我们班那几位漂亮女生竟穿上冰鞋,在湖面上滑起冰来。她们轻盈的身影,欢乐的笑声,能不迷倒我们这些正值青春期的小伙子们吗?

文尾,我发自内心的流出这样的句子:“那条小河,只有谢辛庄有;那时的青春,只有我们确认。”

这篇散文荣获了第八届“冰心散文奖”,谢辛庄的乡间小河,便从我的记忆里流淌进了无数读者的心里,成为一代人的青春意象。我深知,最动人的文字从不是来自空想,而是来自脚下的土地,来自真实的生命体验。

1982年,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,走进北京日报社,成为一名新闻记者。从此,青春的笔便与时代

同行。在新闻与文学的交融之中,我渐渐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道路:以青春激情为底色,以新闻之眼观世事,以文学之心写人生。

胸中不熄的青春之火,使我不止步于完成记者的写稿任务,我定下更高的目标。1991年电影《焦裕禄》上映,引起强烈反响。我完成报道任务后千方百计“追”到李雪健,在他家和他长谈到深夜,他的妻子于海丹见我们谈兴愈浓,默默给我们做了方便面。报告文学《走进焦裕禄世界》交稿了,报社拿出一个整版予以刊登。由于是独家文章,全国众多报刊转载。而我最大的收获,是与雪健、海丹成为挚友。

我的青春曾闪亮在我记者生涯中最难忘的一个国庆之夜。那是1984年,新中国成立35周年。我在见报稿子的开头写道:“缀在西天的晚霞还没有退尽,天安门广场就汇集欢乐的海洋。晚上七时整,联欢晚会拉开了帷幕。顷刻,广场上二十万男女青年同时跳起了集体舞。色彩斑斓、奇幻多姿的夜空下,青年们围成了一个舞圈儿,欢唱着,雀跃着。”那天,我从位于东单报社一出门,就汇入了人们欢乐的海洋。一支支团队看到我胸前红色的记者证(北京

茶、烧肉。是那些流传了千百年的老手艺、老味道、老习俗。

它们如今都融入了这座小城,安安静静,毫无张扬,像四梁八柱,像天罗地网,默默守护和托举着这片天空。

我的思绪太多,睡不着,想诸城,想我的故乡,想那些走了的老人,想身边睡着的小家伙。想着想着,天就快亮了。恍惚中感受到了诸城这块土地的脾性——不急不躁,像淮河的水,慢慢流着,千年不变。

为了踏寻苏先生的踪迹,我去年就去了趟超然台。台不高,站上视野却开阔。淮河在远处静流,常山隐隐约约,像一幅淡墨的画。那天,阳光洒在台前的石阶上,有几个年轻人正在拍照,嘻嘻哈哈的。还有一个老人坐在角落的

# 做客诸城,闻到那种气息

姜广旺

这话看似轻巧,却是用日子换来的感悟。苏轼不是看不见苦,而是看见了,还能从中找着乐。

与诸城这座小城密切相关的,还有宋代的赵明诚。他是现诸城市龙都街道兰家村人,玩石头玩出了名堂,成了金石学家,娶了李清照,写了一部《金石录》,里面收录了与苏轼同时代的许多碑刻。苏轼与赵明诚应是素未谋面,若他们能见面,大约会聊得很好——苏轼喜欢金石,赵明诚喜欢诗词,凑在一起,怕是要说到天亮。

明末清初的时候,诸城还有“张氏四逸”——张衍、张侗、张佳、张俦,堂叔兄弟四人,诗书画俱佳,人称“四逸”。他们隐居在放鹤园里,种菊、作画、写诗、会友。张侗善画雁,张衍写

墨菊,张佳亦工诗善书,张俦的诗跌宕起伏。他们活在自己的世界里,和这座小城一起,慢慢老去。

李澄中也是诸城人。明末战乱时他才14岁,跟着父亲逃难,九死一生。后来考中了博学鸿儒,入翰林院修《明史》。

这些人,来过、住过、写过。他们把一些东西留在这片土地上,正如苏轼离开后写下的“人生到处何似,应似飞鸿踏雪泥”。鸿雁飞过,在雪地里留下几个爪印。这片土地留下的一件东西是古琴,诸城派古琴,琴声清微淡远,被列入联合国非遗名录;还有茂腔,唱的都是家长里短,那调子不高,咿呀呀呀的,却能听的人一边抹眼泪一边笑;还有黑陶、剪纸、绿

长椅上打盹。

看到苏轼那首《望江南》:“春未老,风细柳斜斜。试上超然台上看,半壕春水一城花。烟雨暗千家。”他写的是春天。当时的诸城较冷,但站在那儿,似乎也能闻到那种气息——不是花香,是从心里漫出来的平和。

我对自己在诸城的身份忽然有所感悟:所谓家的感觉,大约就是这样——在一个原本不属于自己地方,一次次做客,一年年待下去。待着待着,就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印记。不是你出生的地方,而是你一年一年回来、一年一年待下去的地方;是那些老人、那些味道、那些老话、那些习俗,一年一年把你接住的地方,是让你觉得你也是留下过爪印的地方。



汗吟

城市的灯光再亮,也亮不过老家的灶膛,回家看看是每个游子的愿望。那天我们从中午12点出发,直到第二天凌晨,车终于驶进山东诸城。5岁的儿子在后座睡着了,诸城是他的外婆家。

去年第一次去诸城,我心里还有些说不清的滋味。不是不好,是不习惯。今年再来,好像顺了。

顺了。这个感觉在心里转了一圈,又转了一下。想起900多年前,有个人也来过这里。他是苏轼,从杭州来,官职降了,所到之处蝗灾旱灾不断。可在这儿修了一座台,取名“超然台”,还写下一篇记:“凡物皆有可观。苟有可观,皆有可乐,非必怪奇伟丽者也。”



扫码关注朝花时文公众号,遇见更丰富的阅读。

# 解 秋 日 报 连载广告

## 刊登内容

-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
-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
-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
-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
-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

电话: 021-22898598

## 江湖黑话骂土匪

云南风光奇特,民族众多,民俗生活多姿多彩。来自美国芝加哥的温德,到了这个中国的边远省份,犹如进了万花筒,目不暇接。云南景观林林总总,近有烟波浩渺的滇池、高悬绝壁的西山龙门、总重达250吨的铜铸“金殿”,远的有白雪皑皑的玉龙雪山、波光粼粼的海海、连峰嵯峨的苍山。此外,云南特有的植被景观、繁花绽放的草甸、牛羊不入的原始密林,都是旅游的好去处。温德好动、好游,又无牵无挂,这些美丽风光不时令他心驰神往,闲暇有伴时,他就四处出游。

一次,温德找了个朋友做伴去一处偏远的道教圣地旅游。那里路途遥远,人迹罕至。经过一座山林时,林深路窄,光线昏暗,两人忽然听到一声大喝,吓了一跳,三个穿黑衫的人从路边跳出,挡住去路,温德意识到遇上土匪了!温德的朋友不禁后退了一步,手足无措。只见对方为首的端着长枪,身后两个举着明晃晃的长砍刀。温德瞥一眼领头那个人端的长枪,发现它原来是民间常用的火铳。那火铳放一枪就要装一次火药,看来他们是“业余”土匪。温德把头一昂,挺起胸,厉声骂起来,骂声一出口,土匪愣了一下:这洋人居然还会用中国话损人。领头的定睛看温德,只见他人高马大,瞪着大眼,翘着八字胡,手中还握着粗大的文明杖。有个土匪提醒领头说:“叫色唐点(洋人的意思)骂下方子!”温德一听,马上回应:“野鸡骂头钻,哪能上天



# 中国情缘

### 费正清和他的朋友们

陈宇 著

王山!”土匪大吃一惊:这色唐点还懂我们的黑话!只见温德举起粗大的文明杖,对准三人。看着黑洞洞的手杖头,土匪有点胆怯。当地民间传说,洋人文明杖里藏着长剑,还有说是长枪管,会啪啪地连发。温德吼一声道:“方子别想要,喷子里还有三粒白米!”只见领头的土匪退了一步,忙往身后摆摆手,示意后撤,三人都退到林中暗处去了。原来,温德极有语言天赋,会英、德、法、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,平时听到一些江湖黑话与暗语,就记在心里。此时他急中生智,那些黑话与暗语全派上了用场。事后温德对那位朋友说:“人在走投无路时胆子就大了。其实,那些黑话我仅知道只言片语,凑合用了。土匪要是再纠缠下去,我也会撤了。”此事传开后,在温德口耳相传的传奇里,就增加了一节“国骂洋骂加土骂骂退土匪”的段子。

费正清到唐家花园,虽然见到了几位老朋友,却还没见到温德与闻一多。他们三人的缘分,要追溯到老清华。当初,费正清是来清华的留学生,学历史和汉语。后来,牛津留他的奖学金到

期,幸好清华给了他一个教职,才使他得以继续学习与研究,这么一来,三个人就变成老清华的同事了。唐家花园的几个老朋友告诉费正清说,美国驻昆明的领事馆最近有个招待会(不时举办,主要起介绍美国文化与联络感情的作用)。朋友们说,在这样的场合,有温德就有闻一多,有闻一多就有温德。

那天到招待会,费正清一眼就瞥见高大的温德,却没见过闻一多。费正清的视线在人群中搜索,终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:那人侧身站着,嘴上衔着一个大烟斗,架着一副老式眼镜,穿一袭长衫。那就是闻一多,他正跟另一个人交谈。待闻一多回到温德身边时,费正清就凑上去跟两人寒暄。他细看闻一多,发现闻一多苍老憔悴多了:浓密的头发不经意地向四喷射,显得人桀骜不驯;脸上的肌肉呈现出粗粝的块状排列,就像是用刀削斧凿出来的;皱纹又长又深,如沟壑纵横,沉淀着沧桑岁月的印记。闻一多从长沙到昆明,是参加师生步行团来的,风餐露宿,备尝辛苦。到了昆明,他家人口多,生活担子重,才四十多岁的人显得比五十八岁的温德

还要老。温德告诉费正清,闻一多过度消耗了体能,白天要上课、搞研究,晚上还要在一灯如豆的斗室里进行“手工业生产”。费正清听不明白,问什么叫“手工业生产”。温德解释说,当时教授们薪水低,物价高涨,他们的薪水常常只够全家吃两个星期的饱饭,许多人只好兼点别的事补贴家用。最多的是到中学兼课,闻一多也在一所著名中学兼了课。当时,只要能赚点钱,做什么的都有,大家各显神通。化学教授曾昭抡帮人制造肥皂出售,赚得多些,算是“富翁”了。有的教师托当司机的学生从滇南捎红糖到昆明零售。最没实际技能的,就摆摊。如社会学家费孝通,就在任教的云南大学门口摆摊卖大碗茶,即便如此,好景也不长。闻一多是在中学只教了一年就被辞退了,原因竟然是“向学生散布民主自由思想”。闻一多因为在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时学过雕刻印章,就想捡起这手艺,课余时间摆摊刻字。他备了一张桌子,挂了个“多摆印”的牌子,才摆摊一天,就被人劝了回去。堂堂联大教授、著名学者、著名诗人,在街头摆摊,跟算命测字、八卦看相的为伍,学校在面上难平众议。但闻一多的经济困难实在无法解决,经过争执,校方想出了一个权宜之计:由梅贻琦、蒋梦麟、杨振声、唐兰、朱自清、沈从文、罗常培、罗永等十一位名教授联名,为闻一多在报上登一则高雅的碑体文治印广告,让他能在家中刻制印章,免去街头摆摊之苦。

因为有几十几位像梅贻琦这样的名人大家的推介,加上又有一批热心的学生帮助揽活,找闻一多刻印的人络绎不绝。又因许诺七天刻成取件,时间十分紧张,他不得不夜以继日赶工,因此陷入研究与谋生的矛盾之中。